

1941-1949年 苏中关系中的新疆

СИНЬЦЗЯН В СОВЕТСКО-
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1941-1949ГГ.

(俄罗斯) 瓦列里·阿纳托里耶维奇·巴尔明
(Валерий Анатольевич Бармин)

杨海明根据巴尔瑙尔国立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译出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U.S.A.
美国南方出版社

1941-1949年苏中关系中的新疆

杨海明 译

责任编辑：向 琿
版面设计：侯国强

Xinjiang in Soviet-Chinese Relations 1941-1949 © 1999 by Valery Anatolievich Barmin

Xinjiang in Soviet-Chinese Relations 1941-1949 中文版 © 2023 by Haiming Yang

Published by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 Alabama, U.S.A.
<http://www.dixiewpublish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a review.

本书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023年7月DWPC第一版

开本：229mm x 152mm
字数：130千字

Library of Congress Preassigned Control Number : 2023941600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 : 2023941600

国际标准书号 ISBN-13 : 978-1-68372-555-8

作者简介



专著作者瓦列里·阿纳托里耶维奇·巴尔明为俄罗斯阿尔泰国立师范大学公共历史教研室主任，《俄罗斯-东方》教学科研实验室主任，历史学博士、教授。阿尔泰国立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成员。科研兴趣范围：苏中关系领域和苏联1918-1960年对外政策领域专家；现今的科研兴趣是苏联以及超级大国在中国新疆省的政策。是多项国外、国家和国际科研基金获得者。发表作品：6部学术专著的作者和合作者；5部教学和教学方法参考书的作者，发表176篇学术论文。获奖：高等专业教育荣誉工作者称号（2006），高校功勋工作者称号（2011）。

译者简介



杨海明，1982年毕业于河北师大外语系俄语专业，1987年毕业于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俄苏文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在《外国文学研究集刊》、《河北师大学报》、《北京电影学院学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发表多篇论文和译作。1993年出版《世界电影百科全书》（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出版长篇小说《西北行》（民族出版社）、2016年出版译作《征服西伯利亚》（台湾人间出版社，繁体字；2017年中国社科出版社出了该书的简体版）、2019年出版第二部长篇小说《最后的贵族》（香港国际品牌出版社）。政论集《信仰与迷信—当代中国的魔幻拼图》（2023年，美国南方出版社）。

目 录

译序	001
引言	006
第一章：1941～1944年苏中关系中的新疆	011
1.1. 1941～1942年上半年苏联和新疆省的相互关系	011
1.2. 1943～1944年苏中关系的恶化和盛世才的新疆 政策	023
第二章：苏联和1944～1945年新疆的民族-解放运动	039
2.1. 盛世才辞职后新疆的政治局势	039
2.2. 三个北方行政区的起义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 建立	046
2.3. 苏联对1944～1945年“三区革命”的立场	056
2.4. 苏中关系正常化及其对1945年后半年-1946年初 发生在新疆的事件的影响	077
第三章：1946～1949年间的苏联和新疆	101
3.1. 1946～1947年间新疆联合政府的建立和活动	101
3.2. 苏联和新疆省在联合政府活动期间的相互关系	118
3.3. 新疆和1948～1949年的苏中关系	129
结束语	152
参考文献	155
附录1《天山血泪—苏联和三区革命》	164
附录2 雄鸡泣血唱天明	179
附录2《俄乌战争漫谈》	189

译 序

“三区革命”是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

20世纪40年代发生在新疆的“三区革命”是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它的发生同当时的苏联有密切的关系。“三区革命”引起了包括中、苏两国学者在内的世界各国学者的极大关注。有关此事件的专著可谓汗牛充栋，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由于当时苏联档案不解密，资料不全，所以关于此次事件的真相扑朔迷离，尤其是对苏联与事件的关系等内幕的描述，总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或者说“点到为止”、浅尝辄止。苏联解体后，档案解封，俄国学者依据开放后的资料重新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挖掘、梳理，使得它的“庐山真面目”和与苏联的关系才逐渐浮出水面，巴尔明教授的专著《1941-1949年苏中关系中的新疆》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应运而生。巴尔明教授是一位严肃的研究俄中关系、苏中关系的资深学者，他的教学和科研成果极其丰富，是当代俄罗斯史学界中、俄关系领域的翘首和领军人物。他这部关于“三区革命”的著作在理论、史料方面具有开创性，是我国学者揭开罩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上的神秘面纱不可或缺的。

“三区革命”的发生，苏联脱不了干系，因此要弄清苏联插手新疆事物的来龙去脉恐怕得从沙俄、苏俄与新疆的历史渊源谈起。通

过1864年签订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沙俄割去我西北44万平方公里土地，中、俄不幸成了邻居（以前中国与沙俄接壤的西段边界仅有沙宾达巴哈至喀拉玛岭一段），但老沙皇侵略的脚步并未停止，它把目光又盯在了西北最广袤、最富有的新疆上面。1865年，沙俄趁英国人扶植的阿古柏占据我南疆之际，借口保护俄国侨民，1971年出兵抢占我伊犁。1878年左宗棠收复新疆大部后，1881年，曾纪泽与俄国谈判，双方在圣彼得堡签订《中俄伊犁条约》，中方收回伊犁，但沙俄勒索的赔款由500万卢布增至900万。此后至1934年苏方出兵助盛世才夺得新疆政权，期间虽经俄国政权更迭（十月革命）、中国清朝灭亡（辛亥革命），但两国在新疆的政治、经贸关系还算正常。

在苏联红军的飞机、大炮支持下打败两个主要对手马仲英、张培元的盛世才自然要对救命恩人苏联投桃报李。因此，苏联不仅在新疆取得了与之进行贸易的特权，1940年还通过与盛世才签订不经中国中央政府批准的非法的为期50年的《新苏租借条约》，攫取了新疆的石油、有色金属的开采权，以及与工业、交通有关的各种资源的勘探权。盛世才打着亲苏、亲共的旗号，从苏联获得了大量援助，苏联也不失时机地把自己的触角伸到了新疆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此时的苏、新关系可谓“蜜月期”。

然而，随着苏德战争的爆发，特别是战争初期苏军的失利，盛世才觉得苏联这棵大树靠不住，要倒下，于是露出了他反苏、反共的真面目，加快了脱离苏联向国民党靠拢的步伐。他通过炮制几次“阴谋暴动案”对中共和苏联势力予以毁灭性打击，迫使苏军和各类工作人员与1943年撤出新疆，苏新关系进入冷淡期。

苏联势力退出新疆是被迫的，它并不甘心。新疆与之比邻，对其有巨大的诱惑力，它在窥测时机，随时准备卷土重来，而残暴的盛世才在新疆的恐怖统治给苏联人可乘之机。“盛世才十年督办，

十万人头”，他的暴虐统治搞得新疆天怒人怨，激起人民的激烈反抗。瞅准这一时机，苏联人利用百姓对盛世才、国民党的仇恨，将大批在苏培训、学习的来自新疆的青年布尔什维克派回故土发动群众，将企图在新疆搞独立的泛伊斯兰主义者和泛突厥主义者用作在三区搞暴动的首批力量，并向暴动者提供大量武器装备，直至直接出兵参战。1944年的“三区革命”就是苏联人借人民反抗盛世才暴政的名义（官逼民反自古皆然），一手策划发生的重返新疆的战略行动。

“三区革命”初期，以艾力汗·吐烈为首的泛伊斯兰主义分子打着反抗国民党统治、独立建国的旗号鼓动哈萨克造反，胜利后建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在许多地区发生了屠杀汉人的惨剧。后在受中共影响下的领导人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人斗争下，在苏联人的协助下，扭转了错误倾向，将坚持分裂的艾力汗·吐烈等从领导岗位开除，“三区革命”走上了团结新疆各族人民反对盛世才国民党政权压迫的正确道路。1949年协助、策应了解放军向新疆的进军，新疆和平解放后，三区的民族军改编为解放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作出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人民的奋斗，对于全新疆的解放和全中国的解放是一个重要的贡献”的结论。因此，我们必须看到，“三区革命”有苏联操纵的开始，也有融入中国革命的结束，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应当给予客观、公正、统一的评价，不可拘泥于一点，而不及其余。

新疆联合政府失败后，苏联庇护下的三区成了脱离中国中央政府和新疆地方当局的独立王国。三区的真正主人、后台老板苏联人握有三区这张牌，在处理同中国的关系时完全掌握了主动。它在静观中国内地正如火如荼进行的国共纷争：如国民党胜，中国收回三区的难度极大，甚至新疆有从中国永远分离出去的危险。如同为共产党的中共胜，则另说。1949年4月20日—6月20日，42天的渡江战役之后，中共的胜利指日可待，已成定局。苏联对新政策也随

之发生变化，它及时与中共联系，并建议尽早进军新疆。在中共感召和大兵压境之下，新疆当局通电起义，新疆政权和平过渡，三区自然而然回到了中国大家庭之中。在苏联策动、支持、掌控下的“三区革命”终于落下了帷幕，走进了历史。但在苏联解体，档案开放前，它的真相像被层层迷雾所笼罩，始终模糊不清。

此书问世前，国内外的专著在提到“三区革命”时也指出了苏联插手的事实，但由于上述原因，对其策划的过程，包括苏共政治局如何做出发动起义的决定，起义具体由哪几位将军负责，如何在与新疆接壤的几个苏联加盟共和国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地建立起义人员培训地，苏军直接参战的人员、武器，在幕后操纵“三区”同国民政府谈判等并没有准确的信息，而本书对这些问题一一作了解答。此外，1947年北塔山事件苏军飞机直接轰炸中国军队一事，本书第一次公开承认。最令人对本书作者严肃的治学态度敬佩的是，书中多次指出苏联在新疆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不经中国中央政府同意而同新疆签订各种经贸合同，在三区非法开采石油和矿产。

当然，书中也有一些不正确的提法和界定，例如把清朝和民国对新疆的治理称为“殖民”。这是阅读此书时需要注意的，也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不过，我们翻译此书，主要是看重它的史料价值，而这对于我们的科研是极其重要的。相信此书的出版会给研究中俄关系尤其是苏新关系的学者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对一般的读者了解那段历史也不无裨益。

为了加深对这段历史的认知，洞悉沙俄、苏俄和今日俄罗斯在精神层面的延续、扩张传统的复活和战略布局的继承，了解“三区革命”的具体进程和国军在反抗苏军的战斗中的悲壮经历以及苏联支持“三区革命”和今日囊赞乌东独立，肢解乌克兰吞并克里米亚之间隐约可见的远交近攻、以邻为壑的不死幽灵，特在附录中增加

了译者三篇有关的文章《天山血泪 - 苏联与三区革命》《雄鸡泣血唱天明》《俄乌战争漫谈》。

译者，2023年2月6日。

作者在这部以其主要部分首次进入学术圈的俄国和国外档案资料为依据所写成的学术专著中试图剖析发生在新疆内部政策的变化，以及确定它们对世界上两个大国苏联和中国在20世纪40年代的关系相互影响的程度。专著以大量篇幅证实，许多西方研究者所谓苏联有一个吞并新疆或者在它的范围内建立独立国家的计划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作品面向历史系的老师和学生以及所有对国际关系史感兴趣的人。

引言

几乎已经 50 年了，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 - 苏联和“中华民国” - 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相互关系，对无论俄国还是国外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仍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两个伟大的邻居仅仅在十年内经历的最复杂的变化，这幅由许多影响到他们相互关系中的政策的主客观因素交织而成的精细的拼图，至今仍无法完整、充分地复原该阶段的历史真相。这段历史中一个最复杂、最少研究的题目同该阶段“中华帝国”最大、最富有的省份 - 新疆 - 在苏中关系中所起的作用相关联。

新疆被占领和并入中华帝国是在 18 世纪满清王朝统治阶段，在 100 多年期间，它一直是总督管辖区，而只是在 19 世纪后半期（1884）才得到省的地位。重建的新疆成为中国民族最多的省份，因为在这里居住着“十多个非汉民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鞑靼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蒙古族、锡伯族、满族、索伦人、东干人、俄罗斯人”^[1]。应当指出，新疆的本地居民“……大多数同汉人在语言、文化、宗教、传统和风俗上有极大的区别”^[2]，以至于这个从殖民地所属国分离出的那无数个很难征服的区域自然融入中华帝国那片已定型的独一文化土地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对此还必须补充一点，新省本地居民的社会 - 经济状况在中国对该地区殖民的所有阶段都是非常艰辛的。由于民族的无权状态以及在文化和精神生活领域来自殖民当局方面的种种限制，他们的经济负担也愈加沉重

[1] 参阅鲍格斯洛夫斯基 B.A., 马斯卡廖夫 A.A.:《中国的民族问题(1911 ~ 1949)》,莫斯科, 1984 年, 第 32 页。

[2] 同上。

重^[1]。一方面，这种状况引起了“力图恢复自身国家体制^[2]”的各族人民持续不断的民族解放起义的爆发，而另一方面，对属于同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新省人民与中亚各国和俄罗斯帝国人民建立经贸和文化联系创造了客观条件。俄罗斯帝国的地理位置和工业发展决定了它在 19 世纪最后 25 年在需要大多数新疆出产的商品和原料、向这儿提供了达百分之八十的新省所需的工业产品的同时，也获得了新疆内部市场的垄断地位。

俄罗斯建立苏维埃政权后，同新省全面的，首先是经济方面联系的水平不仅恢复了，而且有了极大的提高^[3]。同新省经济合作的利益如此巨大和明显，使得苏联领导层在采取涉及新疆的革命运动的措施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在 1931-1934 年新疆穆斯林民众反抗中国殖民当局的民族解放运动阶段，苏联政府首先考虑的是，一旦中国行政当局败落，苏联所遭受的经济损失，所以给予它在同

[1] 更加详细的资料请参阅：杜博洛夫斯卡娅 Л. В.《新疆的命运》，莫斯科，1998；费辛柯 П. И.《新疆史》，莫斯科，1935；米亚斯尼科夫 В. С.《17 世纪的清帝国和俄罗斯国家》，莫斯科，1980；杜曼 Л. И.《清帝国占领准噶尔和“东突厥斯坦”》//—满族在中国的统治，莫斯科，1966；霍扎耶夫 А.《中国清朝占领准噶尔和“东突厥斯坦”》，反抗占领者的斗争 //—近现代时期的中国和邻居，莫斯科，1982；车尔内绍夫 А. И.《关于清帝国对准噶尔的殖民》//—全苏青年东方学者学校。第 1 卷，莫斯科，1986；古列维奇 Б. П.《18 ~ 19 世纪中亚民族中的大汉族沙文主义和某些历史问题》//“历史问题”1974 年，第 9 期；库兹涅佐夫 В. С.《19 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莫斯科，1973；Шан Ю э《19 世纪维吾尔 - 东干民族解放运动史论文集》，莫斯科，1976；伊谢耶夫 Д. А.《维吾尔国家“英吉莎”》，莫斯科，1981；别洛夫 Е. А.《20 世纪初的俄罗斯和中国》、《1911 ~ 1915 年的俄、中矛盾》，莫斯科，1997。

[2] 马斯卡廖夫 А. М.《中国的民族问题：1912 ~ 1992 民族政策的理论观点》，学位论文的作者文摘……莫斯科，1994。

[3] 维赫利亚耶夫 М. А.《1917 ~ 1934 苏联同中国新疆省的贸易》//“苏联科学院图书馆同域外东方国家的学术和文化交流”，“1955 年 11 月 24 ~ 25 日在苏联科学院图书馆学术会议上宣读的报告的汇编”，莫斯科 - 列宁格勒，1957；《西部中国（新疆）》//全苏东方贸易局经济信息通告，1930，第 4-5 期；巴留凯吉斯 И. И.《苏联同西部中国的贸易》//“苏联同东方的贸易”一文章和资料汇编，莫斯科 - 列宁格勒，1927；斯拉德科夫斯基 М. И.《苏联和中国经贸关系史（1917 ~ 1974）》，莫斯科，1974。

起义者斗争中全方位，包括军援在内的帮助^[1]。

在镇压穆斯林民众起义运动的过程中，新疆内部的政治生活已经发生了重要的改变。其中包括，作为1933年4月军事转折的结果，在苏联直接支持下，指挥这个地区的中国军队的盛世才将军占据了省长的职位。

新省长在宣称自己亲近马克思主义并在区域内采取某些步骤解决民族问题和使社会民主化的同时，开始实施靠拢苏联的积极政策。同样，苏联领导人因为利用了新疆内部有利的政治形势，所以能够使自己对新省的政治和经济影响达到了如此高的程度，使得当时的许多政治家以及后来的苏中关系研究者作出这个地区事实上脱离了中央政府的控制的结论不是没有根据的。伴随着某些变化的情形在苏联反对法西斯德国的伟大的卫国战争开始之前始终是这样。

法西斯侵略者在反苏战争第一阶段的胜利在中国的许多政客，也包括在盛世才那儿产生了这样的感觉：苏维埃国家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条件下，盛世才决定修正那条建立在利用苏联和中国矛盾基础上，同时由于同自己北方邻居的紧密合作而获得实实在在好处的政治路线^[2]。这种修正要求他首先同苏维埃国家拉开距离，之后彻底断绝同它的所有联系。同时，盛世才为了保持自己对新疆的控制，试图恢复同国民党在几乎八年期间十分冷淡的联系。盛世才的作为引起了一直信任将军的苏联领导层极其负面的反应，并且对苏中关系产生了总体影响，因为很显然，在省长这些措施的后面

[1] 巴尔明 B.A. 《1918-1941 年的苏联和新疆（苏联对外政策的区域性因素）》，巴尔瑙尔，1998；格拉多夫 Ю.Н. 《山隘间的商队 -30 年代不为人知的大事记》// “远东问题”，1990，第 2-4 期；格里岑科 Я. 《发生了什么？》（针对 1933 ~ 1934 年新疆发生的事件）// “远东问题”，1990，第 5 期；古列维奇 B.И. 《塔尔巴哈台之外的地方（出自早期苏中关系史）》// “远东问题”，1990，第 5 期。

[2] 米罗维茨卡娅 P. A. 《20 ~ 30 年代国民党战略中的苏联》，莫斯科，1990，第 156 ~ 162 页。

有中国政府的影子。同样，苏中关系的急剧恶化表现在许多具有国际性质的问题上，也包括在参与了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的反希特勒同盟国家的互助程度上。处在源于这些复杂过程的另外一些因素之中的新疆因素的作用，由于许多原因，首先是因为史料的局限和人所共知的有关方面对吸引研究者关注这个题目不感兴趣，所以到目前为止，它没得到应有的评价。

同 1944-1949 年发生在新疆领土上，在历史文献中被称作“三区革命”的新省本地居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出现和进程有关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并且迄今为止实际上没有得到研究。苏联在组织和支 持这个运动中的作用被几乎所有在自己著作中涉及 40 年代发生在新疆的事件的研究者所提及，然而，由于他们缺乏俄国档案材料，这种作用仍然不明确。

所有这些情况引起作者对该题目的兴趣并确定了他的研究对象。在所呈现的这部作品中，作者试图观察和分析发生在新疆内部的政策的变化，以及确定它们对 1941-1949 年苏中关系影响的程度，揭示苏方参与组织和支 持 1944-1949 年新疆本地居民民族 - 解放运动的作用、意义和后果。

这部专著是作者对与 1918-1949 年苏联的新疆政策有关问题的研究工作的继续。这个题目框架内所使用的涵盖了 1918-1941 期间的研究材料在 1998 年发表的《1918-1941 年的苏联和新疆（苏联对外政策的区域性因素）》^[1] 一书中曾得到阐释。眼下这部著作同已发表的作品一样是以俄罗斯和国外的档案材料为基础的，这些材料的绝大多数都是首次进入学术圈。这部书的写作同样多多少少吸收了国内外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因为它们毕竟触及了专著中所研究的

[1] 巴尔明 B.A. 《1918-1941 年的苏联和新疆（苏联对外政策的区域性因素）》，巴尔瑙尔，1998。

问题。作者希望得到读者的反馈和意见，因为他打算继续该题目的研究工作。

作者向为本书的写作提供帮助的巴尔瑙尔师范大学研究生李芬和提供影像资料的美国驻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使馆工作人员肖恩·罗贝尔茨表示感谢！

第一章

1941-1944年苏中关系中的新疆

1.1

1941-1942年上半年苏联和新疆省的相互关系

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开始以最极端的形式表现在苏联的国际关系中。遭受法西斯德国和它的同盟者无端侵略的苏维埃国家出现在了那些此前已经同法西斯斗争的国家的行列之中。这种状况客观上使得苏联同一些其政府不久前还把消灭“共产主义威胁”和它的代表者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的国家相接近。在这些转变的背景下，到1941年底，苏联同从1937年起自身就进行反对军国主义日本侵略的斗争，与此同时得到自己北方邻居积极和全面援助的中国的关系一直相当的稳定。德国进攻苏联之后，抗日民族阵线的参与者——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宣布自己同苏维埃国家相互支持，以及准备“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团结，将日本帝国主义者从中国赶出去并以此作为对苏联的帮助^[1]”。

[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莫斯科，1953，第45页。

苏联提供给中国的武器的主要部分 - 弹药、装备和战略物资，是通过新疆省运去的，新疆也由此成为战斗中国家主要的后方基地和运输动脉。在伟大的卫国战争的最初岁月，对中国所有形式的援助都继续在原先的，也就是两国间协议所规定的规模上进行。许多对中国有最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的企业正在新疆各地工作或者处在开始运营阶段，其中有飞机装配工厂、独山子石油加工联合企业、三个木材厂、三个电站、两个电话局、乌鲁木齐的无线电台、伊宁的面粉厂、几个大型的汽车修理部等等^[1]。应当指出，新疆省长盛世才将军和新省各级官员对新省范围内的这些职能企业以及所有的苏联组织和机关在从苏联往中国转运商品时所作的卓有成效的工作给予了相当积极的协助。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包括中共主席毛泽东的胞弟毛泽民在新疆省政府和各行政区领导中继续占据了重要的职位。担任阿克苏和田行政长（专员）的还有共产党人黄（火青 - 译者注）和潘同（潘柏南 - 译者注）。这个阶段共产党人在新省各个行政管理机构中总共占据了超过 200 个不同的职位^[2]。此时，以中共中央委员陈潭秋和方林（邓发 - 译者注）为首的中共八路军办事处正在新疆的领土上活动，而且省政府给予了这支部队不定期的但非常重要的帮助：供给食物和发给服装^[3]。在新疆地界 - 哈密，部署了（苏联）红军第八骑兵团，而在乌鲁木齐地区，驻有苏联空军的航空大队。1941 年期间，从新疆往苏联继续运送大批粮食、军马和冬装。新疆居民同全中国居民一样以极大的同情心关注着苏德战线上事件的发展。仅在 1941 年，只一份维吾尔语的“新疆日报”就在自

[1] 斯拉德科夫斯基 M.И.《苏联和中国经贸关系史(1917 ~ 1974)》莫斯科, 1977, 第 148 页。

[2] 列多夫斯基 A.M.《1942 ~ 1952 年在中国的外交工作。我如何成为一名外交官》//“近现代史”，1993，第 6 期，第 110 页。

[3] 哈吉姆巴耶夫 A.A.《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新疆本地居民的民族 - 解放运动》// 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专题报告，第 4 期（120），莫斯科，1971，第 93 页。

己的版面上刊登了 17 篇苏联报纸上发表和转载的文章，单这个事实就足以说明新疆居民对来自战斗中的苏联的消息的关心。同时，这个阶段新疆还用在此居住的民族的六种语言出版了二十几种报纸^[1]。乌鲁木齐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表鲁德钦柯发布的有关带有文献作者短评的苏联期刊订户的信息成为新疆领导层和省舆论界对苏联正在发生的事物给以极大关注的实例。进入这个名单的有下列人士：

1. “盛世才 - 中苏文化协会名誉会员。常给“反帝战线”杂志写文章；

2. 周斌 - 内务部司长。社会活动家，中苏文化协会的活跃分子。关注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

3. 孟一鸣 - 编辑委员会主任，懂英语和不多的俄语；

4. 王宝乾 - 外事局主任，中苏文化协会新疆分会会长。王先生是中苏文化协会在新疆的组织者和事实上的领导人；

5. 盛世骥 - 进步人士，曾在苏联学习；

6. 李一欧 - 乌鲁木齐学院院长和教育司司长；

7. 鲁寒 - 乌鲁木齐师范学校校长；

8. 邱毓熊 - 司令部政治处处长；

9. 李溥霖 - 建筑司司长；

10. 臧谷峰 - 财政司司长；

11. 李英奇 - 警察局长，中苏文化协会理事会成员。（在警察部门工作的有许多懂俄语并在苏联待过的人员）；

12. 汪鸿藻 - 新疆军队著名的领导人，中苏文化协会理事会成员；

13. 余德一 - 建设委员会主任；

14. 徐韬 - 中国地方素著威望者，进步人士，积极维护同苏联的

[1]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ГАРФ），Ф.（全宗）5283，Он.（目录）18，Д.（案卷）28，Л.（页）140。

友谊：

15. 潘柏南 - 哈密市市长, 进步人士, 积极维护同苏联的友好关系;

16. 秦语湘 - 焉耆行政长”^[1]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焉耆分会 1942 年 5 月 10 日的信息函宣布, 在英吉沙和莎车举办的“反法西斯巡回展”吸引了上述城市居民的极大关注。“在英吉沙, 三天时间里有 1 万人参观了展览, 而在莎车八天里一有超过 22000 人^[2]”。此时, 在和田任领事的苏联外交官 В.И. 伊万琴科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指出, “苏德战线上的事件吸引了中国的社会舆论……. 在新疆所有地区的团结运动持续发展。1941 年新省劳动人民就已经向苏联援助基金转交了一百万元^[3]”。必须指出, В.И. 伊万琴科所援引的新疆居民对苏联人民的无私援助的事实绝非唯一的。在新省工作的苏联领事馆的报告中, 在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代表们关于该协会新疆分会的活动的通告和总结中, 都举出了这种帮助的许多例证。1942 年 6 月 29 日, 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馆的工作人员列文索夫向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中央理事会通报: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和田代表报告, 和田地区总共为援助基金征集了价值 13 万新疆元的货币和各种各样的贵重物品给红军^[4]”。从新疆给予中国交界的苏维埃共和国输送的钱财和礼物经常甚至不标注寄送者组织的地址和名称。例如, 1942 年 4 月 30 日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馆向新疆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表鲁德钦柯寄去下列函询: “我们从阿拉木图海关得悉, 4 月 15 日从新疆往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部代表处给红军和疏散居民寄去 15 件 (重达 360 公斤) 礼物。请告知是什么组

[1] ГАРФ, Ф.5283. Оп.18. Д.28. Л.175-178.

[2] 同上, 第 45 页。

[3] 伊万钦柯 В.И. 《……完成自己的职责》: 取自外交官笔记。莫斯科, 1990, 第 138 页。

[4] ГАРФ, Ф.5283. Оп.18. Д.28. Л.73.

织寄送了这些礼物^[1]”。与此同时, 苏联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初期军事上的失利、丢失大片领土和相当部分的滞留在敌占区的工业, 开始逐渐在包括蒋介石在内的许多中国政治家当中产生了苏联大势已去的印象。同法西斯德国开始的战争降低了苏联介入对日战争的预期, 尽管蒋介石政府仍然力求达成这一点, 但它毕竟在中国领导人改变对苏联的态度上开始起一定的作用。认为“中国报刊竭尽全力, 以便更快地挑起苏联和日本之间的冲突”成为 1941 年 8 月苏联大使馆为外交部所作的有关中国报刊述评的结论之一^[2]。

两国关系中急剧变化的政治气候使得无论是苏联领导层, 也无论不管怎样都同与中国合作的问题相关的各层级的外交人员开始担忧。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外交人民委员部代表斯米尔诺夫对正在发生的过程的评价无疑表现出对此问题的关注。在向委员会递交的关于中国驻阿拉木图领事在红军失败时表现出的不道德的行为的事件的报告中, 苏联外交官得出了非常有代表性的结论。他在其中写道: “完全可以不涉及这些‘琐事’, 但这些‘琐事’是现象, 极其重要的现象的本质。他们展示和反映的不仅仅是用野蛮、厚颜无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领事本人的情绪, 而是某种更恶劣的: 我们的‘朋友’的惊慌失措和动摇, 他们的目光集中到了我们的敌人方面, 并且思想上过早地担心: ‘如果不成功?’ ……”情绪根据“天气”而变化……。伪善、胆怯、动物式的恐惧—这就是领事行为中用笨拙、野蛮形式表现出的那些东西, 一仿佛是派遣他的那些人的情绪的回响。必须对此加以关注!^[3]

中苏关系明显冷淡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那就是: 在向自己的作

[1] 同上, 第 100 页。

[2]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 (АВП РФ), Ф (全宗). Референтура по Китаю (中国问题咨询处), Оп. (目录) 25, П. (卷宗) 201, Д. (案卷) 14, Л. (页) 118.

[3] АВП РФ, Ф. Референтура по Китаю. Оп. 25. П. 202. Д. 25. Л. 20.

战部队提供所有必需品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苏联方面到 1942 年初已不能按照以前的规模向中国提供武器和消耗中的战略物资，这特别涉及轰炸机和歼击机、坦克、大炮和炮弹、汽油和备件。中国领导人利用每一次可能的机会向苏联官方指出在履行合同义务时出现的偏差。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在他拜访苏联领导人的过程中经常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向苏联方面在提供多批次已付款的汽油、汽车和飞机备件等问题上违约。在外交部副人民委员 C.A. 罗佐夫斯基同中国大使的谈话笔记里满是这样的内容，比如：“大使来专门谈起对中国极其重要的汽油^[1]”，“邵力子提出了当时都是从苏联运去的有关向中国提供汽车和飞机备件的问题^[2]，也就是说，大使又在要求汽油。”最后，罗佐夫斯基答应向米高扬转达大使的请求后，认为同时必须对邵力子直言相告，“近期出现的形势本来特别不宜于出口，其中包括向中国提供汽油^[3]”。同时，在上述阶段担任苏联驻中国大使的 A.C. 巴纽什金在其回忆录中指出，例如，在此之前已经提供给中国的炮弹，当他的军队在现在这种作战强度下，至少应够十年之用^[4]。然而，感到对中国商品，首先是这样一些比如钨、锡、锌、镍的极端的需要，苏联，就像已经指出的，大体上履行了根据 1938 ~ 1939 年的苏、中协议所应承担的义务，继续向中国供应它所需要的工业产品，“而且在某些场合下，它们甚至比此前更快地运到了中国边境^[5]”。

然而，苏联方面采取的旨在维护与中国的国家间关系现有水平的措施已经不再对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产生重要的影响。1941 年 12

[1] АВП РФ, Ф. Лозовского, Оп.25.П.200.Д.6.Л.24。

[2] 同上, Оп.29.П.204.Д.9.Л.8。

[3] 同上, Оп.25.П.200.Д.6.Л.34。

[4] 巴纽什金 A.C.《大使回忆录》：1939 ~ 1944 年的中国，莫斯科，1981，第 154 页。

[5] 斯拉德科夫斯基 М.И.Указ.соч.，莫斯科，1977，第 142 页。